

另一种秩序、公正与平等 ——明清秘密教门的信仰与互助

刘 平

一、引 论

直观而言，中国社会可以分为“显性的”与“隐性的”两个层面，作为“另一个中国”，秘密社会，或曰地下社会，是“中国社会”的真实模拟。故而，我们在讨论“秩序”、“公正”等问题时，也有必要着眼于那些不为人知的社会集团，¹本文就明清秘密教门内部的一些问题展开讨论。

民间教派、秘密教门之类，都属民间秘密宗教结社，除了弥勒教、白莲宗、摩尼教等教派的影响以外，明清时期三教合一思潮对秘密教门信仰的形成也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明清时期的秘密教门，大多拥有自己的经卷（一般称为宝卷），多以杂糅儒释道三教与民间信仰的内容为其特色。

由于明清教门日常潜伏民间，蓄势待发，往往对社会秩序构成威胁，所以，历朝统治者莫不视为心腹之患，严加惩治，但由于他们触角四伸，网络密布，代代继起，难以根绝。教门的起事与叛乱，与其信仰有着密切关系。关于教门的信仰，明代一位官员曾评论道：“以成佛成祖之邪说，蛊惑人心，以为帝为王之狂谋，激动众听。谬谓得其法者，不逢灾患。遂至从其教者，遍满闾阎，结会传香，订盟啸聚，阳以举行善事，阴实包藏祸心。有司惧发大乱之端，无故不敢挑衅。奸民遂乘多数之候，挟众辄自争雄，难方起而决裂难收，响甫传而徒党并起。”²这种议论流于表面。实际上，明清教门的信仰主要包括：1、“三佛应劫”说，2、无生老母信仰，3、“末劫论”，4“劝善思想”。

对于明清教门的蔓延，仅仅用阶级压迫之类的思维模式是无法解释的。有人在谈到明代教门情况时就说到：“有一教名，便有一教主，愚夫愚妇转相煽惑。宁怯于公赋而乐于私会，宁薄于骨肉而厚于伙党，宁骈首以死，而不敢违其教主之令”³。清代教门的情况可能更为严重。如果仔细观察，就不难发现，宗教性与世俗性两个特征构成了教门代代不绝（比如当今中国社会中的会道

¹ 三合会历久不衰，就与其内部的“法律”、平等互助有很大关系——我自己对历史上的三合会有过研究，也接触过海外的三合会。另外，我也与海外的一贯道有过接触，其“热情”、“善良”与“友爱”与文献记载中的一贯道完全不是一回事——自然，其本身信仰与历史上的活动是另外一回事。

² 王以中：《平妖集序》。

³ 《明神宗实录》卷五三三。

门与“邪教”)的重要原因。教门内部的互助是教门组织发展的重要动力。分散的小农经济难以抵挡天灾人祸的打击,如果为他们提供一种集体环境,哪怕是与一般社会信条不相吻合的环境,他们为了生存,也心甘情愿冒险一试。山东巡抚阎敬铭在谈到黄崖山教案时说:“从其教者倾产荡家,挟资往赴,入山依处不下百数十家,生为倾资,死为尽命,实未解所操何术,所习何教而能感人如是之深。”⁴

教门以互助作为吸引民众入教的手段,渊源有自。早在汉末五斗米道时期,“教以诚信不欺诈,有病自首其过,大都与黄巾相似。诸祭酒皆作义会,如今之亭传,又置义米肉,悬于义舍,行路者皆量腹取足,若过多,鬼辄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后乃行刑。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民夷便乐之。”⁵这种以神鬼设教、道民互助、政教合一的社会,反映了底层民众最基本的生活愿望。雍正初年,有官员奏称:“直隶南四府连接山东、河南、山西地方,颇有教门,踪迹诡秘,名号多端。……其诱人之法,若富者入教,令其输钱;贫者入教,反与之钱。贫民贪利,自然乐从。又恐同居之人泄漏,必令举室之人尽皆愿从,方许入教。”⁶嘉庆年间川陕白莲教起义时,“闻教匪之所以愚民者,真空家乡无生老母八字,其词无理而悖,比守襄阳有‘逢三不开口,逢三不出手’之隐语暗记。习其教者,有患相救,有难相死,不持一钱,可以周行天下,故愚民陷焉,其伪造经咒犹未也”⁷

一个陷于困境的人或家庭,如果能在一个团体中找到温暖,得到救助,那么,他们一般是不会去理会这个团体是不是“教门”或“邪教”的;何况,在他们所处的“正常”环境里,根本无法得到“公正”与“平等”,不存在他们所期望的秩序。所以,清代教门把分散的农民纳入一个非理性信仰的王国里,在人们渴望宗教慰藉的时候,宗教信仰与团结互助的双重作用,使他们虔诚地集合在教主的周围,自然而然地形成规模大小不一的组织,一旦遇到时机,大规模起事就在所难免了。

二、明清民间教门的信仰

明清时期,众多民间教门遭到政府的残酷镇压,被迫转入地下秘密传播。尽管律法森严,但是这些类教门依然潜滋暗长,一遇时机,便会揭竿而起。推究其动因,其信仰乃是教门组织的精神支撑,其信仰载体就是教门经卷,将两者糅合利用者自然非创教人与教主莫属。明清时期,教门大量涌现,“每立一会,必出一经”,形形色色的经卷基本上都借用了现成的文化传播形式,如宝卷、科仪、道情、说唱、神像、符咒等,但一般常用宝卷命名。

⁴ 张曜:《山东军兴纪略》,清光绪刊本。

⁵ 陈寿:《三国志》,《张鲁传》。

⁶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朱批奏折”,雍正朝刑部尚书励廷议奏折。

⁷ 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北京出版社,1996年,第428-429页。

宝卷起源于佛教的变文、俗讲,又名“讲唱经文”,后来流变为一种亦佛亦文的民间文学形式——宝卷与宣卷(宣讲宝卷)。所以,宝卷首先是一种在民众中流行的文学形式,其作用在于劝善说教,娱乐视听。大约从明中叶开始,罗教、圆顿教、弘阳教等教门模仿宝卷形式,创造了大量经卷,一般都冠以“宝卷”名目,也有以“经”、“论”、“宝忏”、“科仪”名目称呼的——自汉魏以来宗教、宗教异端与农民叛乱的历史来看,叛乱领袖都是借用佛教、道教的教义、经卷作为思想武器,或者自行编造经卷,广为传播(洪秀全利用基督教如出一辙)。

明清教门经卷的内容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自成一套世界观、宇宙观体系,二是描摹极乐世界、未来世界(真空家乡),三是模仿宗教形式介绍组织方式、传播教义,四是渲染、神化创教人(教祖或教主),五是劝人积德行善、互助友爱以及传授炼丹等升天方法。

明清教门教义的形成,与历史上宗教文化的影响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尽管教门经卷主要是在宣扬“劫变”、“无生老母,真空家乡”的思想,但我们要注意到,这种思想是在吸取佛道经书及其它种类的宝卷后逐渐形成的。此外,历史上的宗教异端和民间教门更是自行制造一些与佛教教义相仿佛的名词。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在我国由来已久,元、明时期更有三教像、三教堂的设置,尤其是明太祖的“三教论”更加快了三教统合的脚步。

明清教门信仰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下面作一些简单透视。

明清教门得信仰内容主要包括:1、“三佛应劫”说,称过去世燃灯佛掌教,现在世释迦佛掌教,未来世弥勒佛掌教,其核心是弥勒佛下生或转世拯救众生。2、明清之际,教门中描画的人类创世主与救世主无生老母形象出现,最后形成教内流行最广泛的“真空家乡,无生老母”八字真言。3、宣扬“劫变”,歪曲佛教中“劫”的教义,以世界陆沉,末劫来临,水火风兵各大灾难齐发来恐吓民众,使之相信惟有入教可以避劫。当然,光是恐吓还不够,还需辅以劝善、迷信等手段,一旦势力坐大,教门首领私欲膨胀,叛逆思想随之产生。下面分别详细论述。

关于“三佛应劫”说。“三佛应劫”又叫“三教应劫”、“天盘三副”,源自佛教弥勒信仰中的“龙华三会”之说。明清教门把佛教世俗化过程中所流传的“弥勒救世说”、“末世说”、“劫变说”同其教内所信奉的“无生老母”糅合,便出现了“三佛应劫”之说。

“劫”就是灾难。“劫变”与“救世”相随。“劫变”观念在教门教义中非常重要,它来源于佛教中“劫”的思想,在佛教世俗化过程中,又泛指天灾人祸,如劫数、灾劫、劫难、浩劫等。道世《法苑珠林》说:“大则水、火、风而为灾,小则刀兵、饥谨、疫厉以为害”。⁸生活在小农经济条件下的千千万万分散的农民,生存能力脆弱,经常遭到大大小小自然的、人为的灾害侵袭,所以,对于劫-灾难有着天生的恐惧感。

世界既有“劫”,便有“救劫”者出现,佛经中的救劫者便是弥勒(Maitreya),据魏晋时译成的《弥勒上生经》、《弥勒下生经》记载,弥勒先佛入灭,上生于兜率天内院,经四万岁(等于人间五十六亿七千万年)当下生人间,于龙华树下成佛,三行法会,广传佛法,拯救众生,人们简

⁸ 道世:《法苑珠林·劫量篇》。

称为“龙华三会”。“弥勒救世”思想出现后，也成为农民叛乱的思想武器之一。在明清教门中，“弥勒救世”演变成为“三佛应劫救世”，并由此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信仰体系。

从目前所见明清教门经卷来看，黄天教、弘阳教、圆顿教等教派都对“三佛应劫”思想有较完整的描述。明末圆顿教弓长撰写的《古佛天真考证龙华宝经》，对“龙华三会说”即“天盘三副说”作了较为全面的描述。该经卷首称：“三世诸佛龙华会者，乃是三佛交宫，同聚一处。燃灯佛铁菩提树开三叶青莲，乃是龙华会；释迦佛铁菩提开五叶红莲，乃是龙华二会；弥勒佛铁菩提开九叶金莲，乃是龙华三会。”并说：“初会龙华是燃灯，二会龙华释迦尊，三会龙华弥勒祖，龙华三会愿相逢”。这是明清教门对龙华三会信仰的基本阐述。

“三佛应劫”说的关键在于“救世”。闻香教、清茶门教的《三教应劫总观通书》以三叶金莲为苍天、五叶金莲为青天、九叶金莲为黄天的说法，分别代表三世佛，并明确提出“三佛轮管天盘”的思想。

明末，教门之“三佛应劫”即“劫变”思想正式形成，对后世教门、会道门影响至深且巨。从宗教层面来说，“三佛”信仰为他们提供了一套通俗易懂的说教，并在信仰中得到某些慰藉；从社会层面来说，清代教门开始以前所未有的态势出现；从政治层面来说，教门将释迦佛比为“人面兽心”，显然是将斗争矛头直指现世的统治阶级。

关于“无生老母”信仰。中国历史上的教门多以佛教神佛为救劫真神，也有崇奉道教神仙的，演至晚清至民国，“三教合一”趋势在教门教义中有更多的反映，除了各教真佛正神以外，还有成百上千、名色不一的杂神。无论这些佛祖、教祖、众神如何法力无边，他们最后都逐渐归依到一位身兼创世主和救世主的女性神——“无生老母”的名号之下：在末劫总收元时，由无生老母派弥勒佛等菩萨降临人间，救度众生，回归老母所在的极乐世界。

据说，无生老母住在太皇天都斗宫，即“真空家乡”。还在世界一片混沌之际，“元始以来，无天地、无日月、无人物”，“古佛出现安天地，无生老母立先天”，无生老母创造出天地日月、两仪四象、五行八卦以及山川河海、草木虫鱼、春夏秋冬，最后她又创造出“人根老祖”伏羲和女娲，“混元了，又生出，九十六亿；皇胎儿、皇胎女，无数福星”。这些皇胎儿女在老母膝下，在真空家乡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由于“乾坤冷静，世界空虚，无有人烟住世，”无生老母遂将众儿女发往下界。⁹

可是，这些儿女们来到东土后，“各配婚姻，酒色财气障慢真心”，贪恋尘世浮华，以至“埋没灵根”，芸芸众生无法再回到无生老母身边，只好在东土蒙受三灾八难的磨难。无生老母思念儿女心切，遂派弥勒等神佛下凡救度。由于弥勒佛下凡尘世，给皇胎儿女带来了无生老母赐予的“护体灵符”，使儿女们不仅可以趋吉避害，遇难呈祥，而且可以回归天宫与无生老母团聚。

在教门经卷中，“真空家乡”指天宫，即人类出生和最后的归宿之地。流落东土尘世的“皇胎儿女”为了摆脱尘世的苦难和生死轮回，只要回归彼岸世界“真空家乡”，便可以获得永生，摆脱

⁹ 《古佛天真考证龙华宝经》“混沌初分品第一”、“古佛乾坤品第二”。

生死轮回之苦。所以，在明清教门中，尤其是清代教门中，“三佛应劫”说是一套比较深奥的信仰体系，而“无生老母，真空家乡”就直白多了。所有教徒莫不以这八个字为“真言”。

关于末世思想。“劫”或者末世思想，在一般正统宗教教义中都有表现，这是宗教导师于虚幻的基本说教之一。但是，宗教的末世论指的是遥远的未来，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必须忍耐、行善、修道，而在教门中，末世思想被凸显出来，教主们刻意宣扬灾难就在眼前，末世就要来临，唯一出路就是入教避劫。前面我们对明清教门教义中的“三佛应劫”说、“无生老母”信仰做了一些介绍，那么，人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要惊动弥勒佛、无生老母前来救劫呢？

弘阳教认为，现在是弘阳之世，故弘阳教当兴，弘阳末劫即将到来。所谓弘阳末劫者，是自创世以来人类面临的最大也是最后的一次劫难。到那时，东土众生，将遭遇到刀兵水火风之灾，天塌地陷，洪水横流，无处投奔，无处躲藏。混元老祖和无生老母，大发慈悲，派遣飘高祖临凡，设立弘阳教，驾定法船，搭救原人，出离末劫之苦。

大大小小的教首们正是利用这种说教为自己的种种私欲寻找借口。沈兆澐《蓬窗随录》记载嘉庆初年川楚白莲教情况时说：“其惑人之法，则曰佛家现在劫、是释迦牟尼佛持世，今劫限已满，过此即弥勒佛出世，世人罪孽深重，将有大灾，嘉庆七年八月十五日有黑风黑雨七昼夜，世人触之皆死，惟习白莲教者有莲花护身，可免此灾。愚者惑其说而从之，又曰：他日世间不习教之人既死，旷土闲田甚多，教中人先纳地税若干，将来按税授田。贪者又惑其说而从之”。¹⁰

应该说，教门、教门宝卷中对种种“劫难”的描摹，正是现实苦难与社会不公的反映。生活于传统农业结构中的小农阶级，往往听凭天灾人祸的交相侵逼，求天无助，告地不灵，恐惧和忧愁笼罩着他们的整个心灵，极其容易陷于对神灵的膜拜，向往着另一种公正、秩序与幸福。

关于叛逆思想。一般正统宗教都有大量“末劫”、“世界末日”之类的宣教，视现实世界为丑恶虚幻，以彼岸世界最终归宿，反映了正统宗教出世性的一面。但正统宗教还有与现实世界相容的一面，那就是，他们并不刻意排斥现实世界，往往给人们以安慰、劝勉和鼓励。所以，在一般情况下，正统宗教与现实社会可以平安相处，而教门则偏执一端，一旦遇着时机，便采取与现世激烈对抗的立场，明清教门被冠以“邪恶”之名，与有野心的教首引导教徒走上叛乱之路有关，其深层原因，则与教门经卷宣扬的叛逆思想脱不了干系——这些叛逆思想主要是把前述教义与现实社会矛盾相联系而形成的。当然，教徒们从信教到参加叛乱是有一个过程的，“盖其初也，惑于妖怪之说而冀免于祸灾；而其终也，卒剽略攻劫而为盗贼之计”。¹¹

关于劝善思想。人们在讨论教门问题时，往往关注其反社会、反政府的层面，对于其宗教、信仰功能，则往往忽略。在中国，民间信仰历史悠久，大量存在于社会生活当中，其表现形式五花八门。民间信仰已经成为传统文化或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具有广泛的社会认同感，信众广泛。从中国历史上看，民间信仰很容易发展为民间宗教—秘密宗教、教门，成为民众发动反抗的工具。

¹⁰ 沈兆澐：《蓬窗随录》卷14，“纪教匪始末”。

¹¹ 练子宁：“与叶知县书”，载潘锡恩：《乾坤正气集》卷186。

应该说，一般民众，并不是抱着“叛乱”的目的加入教门的，而是抱着一种寻求精神慰藉的心理加入的。就明清时期宗教世俗化的过程来看，一般宗教已经难以满足人们的需要，而且，明清教门创教者的动机也是从描摹一个所谓的“宗教王国”开始的，这些创教者的描摹在许多方面甚至代表了被压迫者的心声。

从另一方面来说，教首教主要让一般民众信教入教，便会借用许多当时社会现存的民间信仰，所以，劝善与迷信在明清教门中占有很大比重，它们以宗教信仰的面貌出现，以师徒递传的方式组成，以宗教迷信作为维系内部联系与团结的纽带。这些内容，在一般教门经卷中俯拾皆是。

拿弘阳教来说，其经卷中一再宣扬的伦理道德，几乎全是从儒、佛、道三教经书中撷取而来的内容。劝人学好，积德行善，是弘阳教布道传教的重要内容。以至有人把加入弘阳教称为“学好”。然而在弘阳教看来，在世上积德行善，只能保住人身，来世托生在皇宫，享受荣华富贵，免除胎卵湿化轮回之苦，终究是凡身难久，生命无常，逃不脱死亡的大限。惟有入教，得到无生老母的救度，才能列入仙佛之班。

由于当时普通民众文化水平低下，他们的信仰诉求必然受到教主意愿的左右，载入教以及日常生活中要交纳所谓“种福钱”、“根基钱”、“水钱”等费用，遇到揭竿而起、政府镇压之时，还要搭上性命。黄育榷曾说：“名为苦功，而无一实功；名为悟道，而全不知道。”¹²这些话虽是出于对教门经卷的诋毁，但也确实说明了其内容、文字的浅显，也反映了民众的愚妄无知。亲身主持查禁斋教的左宗棠认为：“斋教一种，即宋时吃菜祀魔教门。其始以戒杀放生、消灾避劫为言，愚民动于祸福之说，易为所惑。迨人数既多，竟敢谋叛逆，戕官踞城，蔓延四起。其党坚交秘，执迷不悟，实有出寻常意料之外。”¹³

三、“修道”与互助

明清教门把天象变化、地震水旱、瘟疫灾异、兵荒马乱等天灾人祸都说成是“灾劫”，而且世界末劫已经来临，只有入教才能避劫。教门引人入教的手段也包括类似宗教信仰的“修道”内容。一般民众也确实是把加入教门视为一种宗教修行的。对此，台湾学者王尔敏有一段很精辟的论述：

民间秘密宗教的传行及在民间的影响力很大。它与民众有如此深厚的关系，完全在于与民众的宗教情感、宗教意识的沟通，已经切中民众信仰的脉搏，知道怎样安抚焦渴的心灵，以什么样的宗教宣传更能争取更多的信众。烧香诵经，为信徒家人消灾免难。严行茹素，戒杀生重放生免灾避劫。敬祀佛祖，求神保佑。医病疗人，除病消灾，避祸致福。传授道术。代行神命，假借神权。扶助孤苦，以利相诱等等传教手段，实际上并不高明，但却迎合了民众低等动机的生存需求，故而极易打动人心。¹⁴

¹² 黄育榷：《破邪详辨》卷一。

¹³ “录副奏折”，同治五年五月初八日闽浙总督左宗棠奏折。

¹⁴ 王尔敏：《秘密宗教与秘密会社之生态环境及社会功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0期，

在诸多教门中，十分讲究修道层次，而且，修道层次的提高是与交纳金钱挂钩的。

弘阳教之教首与教徒是以道士面目出现在社会上，其修道之法就是为人做道场。每当村民有丧葬事情，就请他们去斋醮礼忏，一切科仪都与道士行为相仿，但念的经都是弘阳教经卷。正因为弘阳教以“道流”自居，其活动一般都是公开的，村民都乐于就便请来做法事。许多弘阳教徒即以此为生。当代某些地方的弘阳教则打着道教协会的幌子行事。

应继南无为教和姚文宇龙华会都有“三乘教法”。“三乘”这一术语，即佛教小乘“声闻”，中乘“缘觉”，大乘“菩萨”的三级修持之道。但应继南无为教受黄天教影响，其“三乘”实为“三佛应劫”的教义，而非修行之法。姚文宇龙华会信奉龙华三会说，并相应地提出了三乘教法，即三步修行法：“头一层功夫名小乘，二十八字偈语，第二层功夫名大乘，念一百八字偈语，上乘没偈语，单是坐功。”¹⁵所谓“上乘”坐功，指的是内丹功。除了“三乘”，还有“九品”，实为教阶：小引、大引、祀主、传灯、号敕、明敕、蜡敕、清应、总敕。¹⁶“三乘”加“九品”，合称“十二步道行”。

教门不仅奉行一定的修行方式，还竭力劝人修道，如同一般宗教劝人行善积德一样，其目的是为了在老百姓中树立一个慈善的形象，扩大本教影响。

有人在谈到明代教门情况时说：“有一教名，便有一教主，愚夫愚妇转相煽惑。宁怯于公赋而乐于私会，宁薄于骨肉而厚于伙党，宁骈首以死，而不敢违其教主之令”。¹⁷教主能够约束教徒，正是教门组织的的一个特征。而民众入教，愿意接受某种约束，与教门宣扬互助、在某些情况下也确实实行互助有关。

我们还要看到，分散的小农经济是难以抵挡天灾人祸的打击的，如果为他们提供一种集体环境，哪怕是与一般社会信条不相吻合的环境，他们为了生存，也愿意冒险一试。山东巡抚阎敬铭在谈到黄崖山张积中一案时说：“（张积中）素之才名，祇以伪托诗书，高谈性命，乃至缙绅为之延誉，愚氓受其欺蒙，其家本无厚资，来东不过十载，遂能跨郡连乡，遍列布肆，挟术诓骗。为收集亡命之资，从其教者倾产荡家，挟资往赴，入山依处不下百数十家，生为倾资，死为尽命，实未解所操何术，所习何教而能感人如是之深。”¹⁸张积中被官方视为“教匪”，跟随他的徒众大多战死，但从上述一段话及有关史料可见，张积中是在战乱年代实行了一种“乌托邦”制度，尽管与现行秩序相抵触，那些生活不下去的老百姓却情愿投入其中。

教门以互助作为吸引民众入教的手段，渊源有自。早在汉末五斗米道时期，“教以诚信不欺诈，有病自首其过，大都与黄巾相似。诸祭酒皆作义会，如今之亭传，又置义米肉，悬于义舍，行路者皆量腹取足，若过多，鬼辄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后乃行刑。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民夷

第 39 页。

¹⁵ 《史料旬刊》第 24 期，雅尔哈善奏折。

¹⁶ “录副奏折”，嘉庆二十年十月二十九日两江总督百龄奏折。

¹⁷ 《明神宗实录》卷 533。

¹⁸ 张曜：《山东军兴纪略》卷 21。

便乐之。”¹⁹这种以神鬼设教、道民互助、政教合一的社会，反映了底层民众最基本的生活愿望。

台湾学者庄吉发、王尔敏在谈到明清“民间宗教”问题时说，这些教派虽然被统治者视为异端，经常遭到查禁，但仍然非常繁盛，究其原因便是因为各教派在地方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具有一定的正面社会功能²⁰。其功能大概分为分为心理安慰功能、娱乐功能、社交功能、济助功能、治病健身强体功能、谋生功能、晋升功能等等。同时民间宗教的繁盛也有其客观环境的因素和适存基础，因其“依附民间信仰而创生，取民间信仰之种种内容，以为信仰根本，藉佛道经典为依据，佛道仪节为传布手段，因而能根深蒂固，生机不绝”²¹。应该说，在封建社会的土壤中，教门也是普通农民求生存的一条生路。

雍正、乾隆年间，江浙等地曾屡破大乘教、无为教案（均为罗教分支），两教早在清初就在运河沿线尤其是苏杭地段建有许多庵堂。各经堂分别有房屋数间至二十余间不等。这些经堂与漕运水手关系密切。“平时有各处驾船水手入教往来，每至堂住宿，给与香钱，多寡从便。惟驾船外出回空时，助报数两及数钱不等，以作堂费。其中有老病无归者，即留堂长寄。死后代为埋葬。”²²在清初的杭州，信奉罗教的漕运水手也陆续建有 72 座庵堂，各堂“各置余地，以资守庵人日用，并为水手身故义冢。每年粮船回空，其闲散水手皆寄寓各庵。积习相沿，视为常业。”²³漕运水手与罗教庵堂有如此密切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经济互助在其中发挥作用。

川陕白莲教起义时，“闻教匪之所以愚民者，真空家乡无生老母八字，其词无理而悖，比守襄阳有‘逢三不开口，逢三不出手’之隐语暗记。习其教者，有患相救，有难相死，不持一钱，可以周行天下，故愚民陷焉，其伪造经咒犹未也。”²⁴有些教门则用以富济贫之法行其教。雍正初年，有官员奏称：“臣闻直隶南四府连接山东、河南、山西地方，颇有教门……其诱人之法，若富者入教，令其输钱；贫者入教，反与之钱。贫民贪利，自然乐从。又恐同居之人泄漏，必令举室之人尽皆愿从，方许入教。”²⁵

我们也要看到，有些教门行为并不与社会格格不入，如道光年间直隶南皮县有传习红阳教的张成位、李可学师徒，专门以为人焚香治病为业，信教者多为病人，“每年正、十两月在张成位家做会，讽诵《地藏经》，唱说孝顺父母、和睦乡邻等好话。赴会之人各给钱一二百文不等，名为如意钱，备办斋供，并未入己。”²⁶各教派中人交纳香金的金额有多寡之分，其传教性质也有优劣之

¹⁹ 《三国志·张鲁传》。

²⁰ 庄吉发：《从院藏档案谈清代秘密宗教盛行的原因》，《台湾故宫学术季刊》第 1 卷第 1 期，1983。

²¹ 王尔敏：《秘密宗教与秘密社会之生态环境及社会功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10 期，1981 年。

²² “录副奏折”，乾隆三十三年九月二日江苏巡抚彭宝奏折；另见《史料旬刊》第 12 期，彭宝奏折。

²³ 《史料旬刊》第 12 期，崔应阶奏折。

²⁴ 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北京出版社，1996 年，第 428-429 页。

²⁵ “朱批奏折”，雍正朝刑部尚书励廷议奏折。

²⁶ “录副奏折”，道光五年十二月十九日直隶总督那彦成奏折。

别。万历年间，山东鱼台县一带有位传习罗教的侯表，其组织单位称“社”，社设社长。教徒入教，每人交银一分，交存社长处，作为教徒（社员）缓急之用，因而民众争相入教，其组织发展至数十社之多。²⁷

一个陷于困境的人或家庭，如果能在一个团体找到温暖，得到救助，那么，他们一般是不会去理会这个团体是不是“教门”、“邪教”的。不少教门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常常以扶危救贫、互帮互助的福利功能，来吸引那些生活艰难的民众。

四、入教的功利目的：现世与未来

现实生活中的农民是很讲究功利的，要想让他们入教，仅仅许诺遥远的未来是不够的，还必须予以一定的眼前利益。侯杰等认为：“由于中国民众的宗教情感常常只停留在福祸相长的低等动机上，所以对于信仰所持的功利态度往往毫不掩饰。熟悉民众心理的教门领袖便采用一些不甚高明的小恩小惠的方法，诱人入教，再制造些异乎寻常的现象来迷惑民众，使人们真的相信捐献平日积攒的血汗钱就能换来大富大贵，免去大难大劫。”²⁸

有些教门以日后封官进爵为诱饵引人入教。一般农民，即不可能通过科举、也不可能通过军功找到进身之阶，猛然间得知无中生有，以后或者来世能得富贵，其代价只是数十上百文铜钱，就很容易上当受骗。冯进京、王会混元教就用这种空手套白狼的手段封了数百位男女老少王侯、将军、总兵的职位。其教内人说，王会散给人家合同，凡是“度的人多钱多，就封他做王、做公、做总兵了。”²⁹

八卦教教内“定有八等名号，入教后遇有功行，先封为传仕，由传仕升为全仕，由全仕升为点火，以后流水、总流水、挡来真人、开路真人、指路真人，以次递升。”³⁰

在教门准备起事的过程中，首领们不仅给予今后进入天国的虚弱，更直接答应事成后“加封官职，给与地亩”，在林清、李文成叛乱一案中有位被捕的范采，他是因为听信了传教人的“归教有好处”的劝说而入教的，后来林清起事，说是“事成给我们地亩”，范采遂加入进去。³¹另外一位骨干刘宗林也供称：“林清约令谋反，许以事成之日封为一品大宗师，凡教内之人俱加封官职，给与地亩”³²

正是由于教门教首的不断努力，生活在农业土地上的芸芸众生为了现世与来世的利益，纷纷入教。列宁曾经说过：“农民是一个特殊阶级。他们是劳动者，是资本主义剥削的敌人，但同时又

²⁷ 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1，“罗道教侯表列传”。

²⁸ 侯杰、范丽珠：《世俗与神圣——中国民众宗教意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34页。

²⁹ “录副奏折”，乾隆十八年八月初二日直隶总督方观承奏折并附单。

³⁰ “朱批奏折”，乾隆五十六年七月五日陕西巡抚秦承恩奏折。

³¹ “范采供词”，《故宫周刊》第204期。

³² 嘉庆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上谕引，载章佳容安辑：《那文毅公奏议》卷33。

是私有者。……农民作为劳动者，有摆脱剥削、压迫，向往平等、获得温饱的强烈意愿；但作为私有者，又经常产生不满足温饱，希望发家，一朝有出头之日，获得特权，使自己成为有资产的人”³³发家、出头是愿望，而教门为他们提供了实现其愿望的便捷途径，至于这条路到底通向何方是他们并不知道的。

四、加强互助的现实手段：气功与医疗

对于教门形形色色的表现，统治者一概视之为“妖言邪术，左道惑众”。关于教门首领利用“妖言邪术”传教的情况，我已另文撰述，³⁴此处不赘。教门中的气功问题，我也曾经做过研究，³⁵这里结合医疗问题，做进一步的阐述。

如果说教门教义中的三教应劫、弥勒下生和“真空家乡，无生老母”的信仰曾给沉迷于教门的人们以巨大的启迪或诱惑、使他们追随教门而不愿意回头的话，那么，修炼内丹、坐功运气的的内容则对那些惧怕生死轮回、希望长生不老的信仰者有着更强烈的吸引力。

行气之法，早在先秦时代已经出现。后来，气功成为道教的一项主要修炼内容。至宋元时期，道教内部形成了一整套气功修炼方法，即内丹术³⁶，并与以“服食”为主的“炼丹术”相对应，此即道教内部的内丹派、外丹派。

道教内丹功之“丹”，主要是期望从自身中炼出“丹”来。内丹派认为人的身体即一个丹炉，用天地人之“三宝”为药，熬炼到一定火候，就可结成不老金丹。炼丹过程共分三个阶段：初关练精化气（即小周天），中关练气化神（即大周天），上关练神还虚。这里以“初关”即练精化气为例，其过程大约分为六个阶段：炼己、调药、产药、采药、封炉、炼药。这也是教门尤其是八卦教、黄天教系统的教门的基本修炼方法。在黄天道内的《普静如来钥匙宝卷》“钥匙佛如来开天地妙诀分第十四”中有这样几句话：“过四关，有夹脊，玉枕下降，透寒关，尾闾关，乃为上客”。这里包含了“一把钥匙通三关”的意思，就是用炼精化气之法，开通尾闾穴，经夹脊穴、玉枕穴直达泥丸宫，“合和神水，下降复还丹田”，“后渐渐一起直入脑满，脑满之后，丹自玄膺而下，其味甘，其气香，至此则内丹成矣”³⁷。三关修炼，又叫“三花聚顶”。

教门往往将传授内丹披上神秘色彩，谓之“金丹”、夸为“玄机”。在闻香教中，修炼内丹的

³³ 列宁：《关于用自由平等的口号欺骗人民》，《列宁全集》，第三卷，第 845 页。

³⁴ 刘平：《清代教门中的巫术现象解析》，载严昌洪主编：《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年。

³⁵ 刘平：《论清代教门中的气功现象》，载《论邪教——首届邪教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 年。

³⁶ 方维甸《校刊抱朴子内篇序》称：“迨及宋元，乃缘参同炉火而言内丹，炼养阴阳，混合元气”。

³⁷ 参见《修真太极混元指玄图》、《修内丹法秘诀》。按尾闾关位于脊椎骨的最下端；夹脊关在背部，仰卧时正当两肘尖连线点正处；玉枕关在后头部，正当仰卧后脑着枕处。

方法被称作“真道玄机”，修炼内丹和“三教应劫”的教理结合在一起，系教中机密，秘不示人，除非遇着所谓“有缘人”，才能“显真机，明大意”，“传真诀”。在教门看来，尘世间人本来在“净土家乡、安养国内”，“无形无相”，“无生无死”，“但是，在被打发到东土红尘后，迷失了本性，忘记了归路，只有经过明师指点，才能回归本性，其途径就是修炼内丹。

清代，有的教门如静空教、先天教普遍吸收了佛教禅静气功，但更为普遍的是练习道教内丹派气功，教门中的著名经典如《皇极金丹九莲正信皈真还乡宝卷》、《古佛天真考证龙华宝经》、《普静如来钥匙宝卷》、《五女传道书》等都包含了大量道教内丹思想及修炼方法。从《皇极金丹九莲正信归真还乡宝卷》的经名就可看出，只有修炼“金丹”才能“归真”，才能“还乡”。八卦教的经典《五女传道》一书，通篇都是讲的如何“修炼”成功去见“无生老母”的事。

这些经卷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将教义与修炼气功的内容结合。如混元教《佛说都斗立天后会收圆宝卷》(《立天卷》)“明心见性品第十”中所记有关内容：

九劫青阳斋一步，拔屑抽丁入是极。十八时刻炼真火，现在忏罪心不迷。
 两日炼道二十四，接着骨格退毛皮。三十六时炼丹道，转女成男走漕溪。
 五七炼丹九日内，真心实意诬菩提。二七连环成道果，三七圆满卵生鸡。
 出卵飞升无形像，内里动静有谁知……³⁸

如果要一般教徒弄懂这大段大段的内容恐怕也不现实，因此，许多教门教首往往将其经卷、教义简化成一些通俗易懂的歌诀、咒语，以便于在徒众中流传。教门中的气功现象也是如此。

在很多情况下，教首在传授功夫时，并不那么“教条”，只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嘉庆年间加入义和门的季八供称：“我到新集赶集，遇见王世清劝我学好，把我叫到他家，……领我烧了香、磕了头，教我学好，说是义和门，……还教我坐功运气，修炼鼻眼耳舌。说人头上有三道横纹，为三道紫金锁，眉丛中为人之性，脸为钥匙气为簧，运气冲开头顶三道紫金箍，本性从凶门出，修炼真性，以修来世。”³⁹语句简单明了，还把教义贯彻其中。

练习气功所产生的“美妙”感觉，对练功者来说具有巨大的诱惑力，教首们更是神乎其说。气功在明清教门中大行其道，是因为教门中人（当然主要是教众）不必通过他们所缺乏的钱财就可达到强身、“致幻”、“升天”的目的。所以，练功治病、引人入教成为教门发展势力的一种重要手段。

人们平日因为种种苦难而产生的痛苦心理在教门中得到了诸多神灵的抚慰。许多教主会首不仅擅长各种与神沟通的法术，还掌握一些或真或假的治病健身的手段。不少教主往往以行医为名传教，或者妄称法术具有医疗的功能。

弘阳教创教人飘高老祖韩太湖素有“正德明医真人”的敕号，其图像也画成（或塑成）颇似药王的形象，俨然是一位包治百病的神医。为人医病成为弘阳教的又一特点。从飘高祖师起，递

³⁸ “录副奏折”，乾隆十八年七月二十五日署理山西巡抚胡宝瑑奏折附件。

³⁹ “季八供词”，“录副奏折”，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初八日广惠奏折。

传到后世的各级教首们，都以为人治病为手段，吸收教徒，扩大影响。其方法无非是诵经求神，杂以气功、打坐等法，喝下供奉过飘高祖师的茶水之类。道光十八年直隶深州县等处破获红阳教，该教“学习盘坐功夫，借画茶治病，煽惑乡愚”。教首王洛增在病人求他治病时，令病人跪在佛前，自己面北烧香，将茶叶一撮供于桌上，用手掐诀，代为祈祷念咒，病人右首与中间如有凉气，俱与医治；左边若有凉气，即不与治。念毕，令将茶叶煎服。偶有治愈者，则“诱令入教”。

收缘会也以茶叶治病。据韩士英供称：“小的入了这胡二引进的收缘会，给他作了徒弟。每季小的给他喜钱二百文，他教给小的默念无字真经四句，说后来有好处。又教小的四句持受茶叶的佛歌，说‘一杯香茶不非经，男女尽在一梦中，仙茶奠在云炉内，身安保安体安宁。’这四句诗受了茶叶，给人吃了，可以治病。小的在家就依法给人治病。”⁴⁰

贫穷和疾病等是威胁人们生存的大敌，教门传教人掌握一些粗浅的治病方法，施医舍药，按摩针灸，再加上一些类似巫术的神秘手段，使教门更具有吸引力，不少信徒也确实是因病被治好而入教的。这其中，有几个因素是我们不能忽视的：一是诸多患者都是贫苦农民，终年操劳，患有一些慢性病，一旦静心调摄、安养，自然痊愈；二是气功、按摩、武术等方法确实具有一定的治病功效；三是带有强烈宗教色彩的说教、行为（讲经说法、举行仪式等）能够使人的心灵得到安抚，带来希望。不了解这些情形，无端加以指责，只能说明我们自身的无知。连攻击邪教甚力的黄育榎也说：“教门或充医卜，或充贸易，遍历各村，亲去传教，而且以敛钱论，则不甚多。”⁴¹ 贫困民众化钱不多甚至不花钱就能治疗疾病，增加了民众对教门的信任。

由于明清时期教派林立，与民众接触的机会很多，而民众面对这些教派时，心态不一，最终入教的原因也多种多样。但有一点是相通的，就是唯灵是信，主要是一种实用主义的观念在作祟。还有一部分人是因为看到了别人入教的示范效应，或者在亲戚或邻居的介绍下而入教。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是教民考虑到信教与身体和命运的关系。多数人是由于本身的一点疾病而入教的。这样例子在民间教派中数不胜数，几乎所有的教派都提供了医疗的方式来诱惑民众入教。⁴²

由上所述，明清秘密教门这类“地下王国”权力的扩张，与其教主为了虚幻的来世利益与实际的现世利益号召民众有关，而缺乏任何保障的小农社会中人，往往愿意投身于这类“宗教”与“迷信”之中而不能自拔。故而，各教主“以成佛成祖之邪说，蛊惑人心，以为帝为王之狂谋，激动众听。谬谓得其法者，不逢灾患。遂至从其教者。遍满闾阎，结会传香，订盟啸聚，阳以举行善事，阴实包藏祸心。有司惧发大乱之端，无故不敢挑畔。奸民遂乘多数之侯，挟众辄自争雄，难方起而决裂难收，响甫传而徒党并起。”⁴³ 雍正也指出教门教主从敛钱起始，以谋逆收尾的必然

⁴⁰ “朱批奏折”，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河南巡抚胡宝瑑奏折附件。

⁴¹ 黄育榎：《破邪详辨》卷3，《清史资料》第3辑，中华书局，1982年。

⁴² 王庆德：《魅力权威与明清民间宗教教首研究》，南京大学博士论文，2002年，第66页。

⁴³ 王以中：《平妖集序》。

趋势：“大率假灾祥祸福之事，以售其诞幻无稽之谈，始则诱取货财，以图肥己，渐至男女混淆，聚处为烧香之会，农工废业，相逢多语怪之人。又其甚者，奸回邪匿，窜伏其中，树党结盟，夜聚晓散，干名犯义，惑世诬民，及一旦发觉，征捕株连，身陷囹圄，累及妻子，教主已为罪魁，福缘且为祸本，如白莲、闻香等教，皆前车之鉴也。”⁴⁴

因此，历朝政府莫不视秘密教门为“邪教”，对其严加取缔镇压，但其结果往往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举止不得要领。本文窥其堂奥，揭其要害，或可为后人引为“参考”欤！

尽管如此，我们要看到，教门的存在与民众的狂热信仰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毕竟，在封建专制的社会里，政府无法为个体小农提供任何社会保障，民众投身教门，与宗教信仰一样，也许是寻求解除苦难、期盼来世幸福的唯一途径。

Secret Sects' Belief and Mutual Aid in Ming –Qing Period

Liu Ping

Shandong University

Secret religion is a special and interesting field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history. From late 1980s on, I have been working on the underworld and popular movements in China. In the meantime, I have special interests on popular religion and popular belief. In recent years, I have published several books on this subject which include: *Culture and Rebellion: With the Angle of Secret Societies in Qing Dynasty*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2002) ; *The Punti-Hakka War in Guangdong, 1854-1867*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2003); *The Folklore Chronicles of China's Underworld* (Jinan: Shandong jiaoyu chubanshe, 2006). Now my article is *Secret Sects' Belief and Mutual Aid in Ming –Qing Period*.

My research defines secret religion as the underground religion, mainly those popular sects prohibited by all imperial governments and excluded from government patronized religion and mainstream society. Over the course of imperial China, numerous popular sects existed and met violent suppression from governments; and therefore they had to go underground in order to survive. Because of their secretiveness and anti-government political potential, they were labeled in official language as “the evil cults”(xiejiao).

The rebellious perspective of secret religion has been in the center of academic research in China in the past several decades. Researches on secret religion are always associate it with the history of peasant

⁴⁴ 《清会典事例》卷 397，“礼部·风教”。

wars. And scholarships are heavily influenced by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and ideology at the time. Since the early 1980s, a new generation of research reexamines secret religion from a new perspective that viewed it more as a popular movement stressing on its origins and organizations. My research examines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popular belief, cultural tradition, and social transition.

Secret religion was rather widespread and entrenched in many periods of Chinese history, and its vitality and exuberance root in Chinese religion, culture, society and politics. Popular culture and popular belief were the knowledge source of common people from the lower echelon of society. Concepts of imperial authority, chivalrous and so on were important components in popular culture. The concept of imperial authority was spiritual motives of sect leaders to start rebellion and found new dynasty. The concept of chivalry is behavior norms popular among common people, though it might transgress imperial law. We know that the concept of code of brotherhood was spread through the popular media of folk literature and drama, called as *Jianghu xiqi* (code of brotherhood on the rivers and lakes). Secret sects picked it up and formed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 concept of morals and *law*. The secret sects belonged to the underworlds, they were incompatible with the upper culture, and folk culture was the natural elements that they used to form their own culture.

Because there are so many secret sects active in different periods and regions, their methods of doing missionary work, types of organization, religious ceremony and discipline, passwords and secret signs, scriptures and believes, everyday behaviors and extreme behaviors (including rebellions) and so on, deserve us to study carefully.

In fact, we can look upon China as two levels. One is clear-sighted, the other is dark. Few people can get insight to the dark one. If we do not understand the dark level of China, we can hardly say that we know a real China. Secret relig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Dark China*, we can get much of Chinese religion, culture and social transition through it.

Secret religion exists and develops in the land of traditional China culture, its organizations and believes were mixed up with traditional popular culture and religious belief. Secret religion was not Daoism, nor Buddhism or Confucianism, though it contained certain elements from the three of them. People often feel bewildered by its mixture. Thus, to understand Chinese religion, we must trace the origin, development, and variation of secret religion.

The coming into being of secret religious doctrine has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influence of religious culture in history. Though most of the sects' scriptures mainly preach the ideas of *kalpa*, *immortal old mother*, *home of vacuum*, we must note that these ideas are formed after absorbing the Buddhist and Daoist scriptures and other similar *Baojuan* (precious scriptures). In fact, the concepts of *kalpa*, *immortals*, *Longhua*, *jileguo* (millennia kingdom) basically belong to Buddhist doctrine; Daoist contents like *therapy*, *keeping in good health*, *qigong* etc., are also the cultivating contents of secret sects;

Confucius ethics norms and moral teachings also give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ir behaviors.

The additional two points should be noted. One is the synchronism that united Buddhism, Daoism and Confucius. It is the religious base upon which secret sects existed and developed. The other is state patronized religion. The salvation concept of Buddhism, especially the belief of Maitreya, became the soul of overabundant secret sects. In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the belief of Maitreya developed into the salvation concept of “Three Buddhas will save the world one by one”. Thereby, the formation of secret sects in Ming and Qing has great relationship with White Lotus Sect, Maitreya Religion and Mani Religion in addition to general traditional religious culture.

Certainly we must note that even if the scriptures and doctrines were soaked with much of rebellion thought, those common followers would not start rebellion simply for belief. What they need was just the satisfactory of religious belief, the appreciation of cultural amusements, and teachings of accumulating virtue, not destroying their family to revolt. Only their doctrine was combined with other social factors that rebellion will be realized.

Secret sects widely borrow the function of ready-made cultural structure in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society. The magic, religious and other cultural phenomenon were the means to motivate followers, organize sects, and set up rebellion. But it contributed to their failures. Secret sects lay low in daily life and harbor their energy and threatened the social order and political authority. The government viewed them as diseases in their vital organs, usually using legal and military methods to punish them severely. But because their followers and missionary networks are spread widely, especially the common customs benefits’ impulse to those chieftains, they could exist generation by generation without being terminated easily.

Therefore, the spread and rebellion of secret sects are important phenomena of Chinese history and social transition. For example, both the Yellow Turban Uprising led by Taiping Sect, the Red Turban Uprising led by White Lotus Sect lead to the replaces of regimes. The White Lotus rebellion in mid-Qing also leads to the decline of Qing Empire. The Boxers’ Uprising in late Qing also had direct relation with secret sects.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political authorities promulgated a series of laws aiming to suppress secret sects, but they did not achieve remarkable effect. Today Falungong in mainland China is also changed into a kind of secret sect.

Despite cruel suppression, secret sects persisted underground. Then how they absorb people join their sects and even start revolts? On the one hand, the sects’ magic and religious flavor and the Land of Ultimate Bliss (described in their doctrine) were no doubt a kind of gigantic magic power; and,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were two realistic ways to curing sickness, building up a good physique, protecting the body, living for ever, going up to heaven to meet *Wushenglaomu* (immortal old mother, a goddess in the sects’ doctrine), one is chanting scriptures and doing kind deeds, the other is qigong, that is the best

method which can reflect directly the sects' magic power. As to Chinese martial arts and medicine, they are also important contents which the sects practicing. Man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martial arts and medicine come from those secret sects.